

自为经纬 成一家言

——喜读李守庸同志《王船山经济思想研究》一书

萧麓父 吕有祥

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李守庸同志的《王船山经济思想研究》一书,是近年来船山学术研究中的一项主要成果。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来说,据我们所知,则是建国以来大陆学者以中国古代某一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第一部专著。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辩证的方法论,紧密联系王船山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学术活动和思想渊源,史论结合、纵横比照,引证详实、评判精当,对王船山经济思想的诸侧面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剖析,从而使船山经济思想的研究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要而言之,此书有如下突出贡献与特色:

一、专题深入,系统评述。船山学术,体大思精,他在“天崩地解”的时代,以“诚知得罪于先儒”的自觉批判精神,通过注经、衍子、评史、论政等形式,在政治、经济、哲学、史学乃至民族、军事、文艺等社会文化诸领域,“推故而别致其新”,创立了具有时代特色、富有启蒙意义的博大思想体系。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中华民族在深重苦难中的觉醒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船山思想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探究。建国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船山学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展开,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八二年两次全国性的船山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及一批新论著的涌现,便是明证。就船山学术研究的总趋向而言,八十年代出现某些新特点,即把宏观概论、整体把握,和具体剖析、专题深入相结合,着意向专深方面发展,诸如对王船山的“认识论范畴”、“辩证法体系”“历史观及史论”等加以集中阐扬等,但仍多偏于哲学思想方面。李守庸同志的《王船山经济思想研究》亦是应势而出的专题论著之一。此前,王船山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不多,

虽在某些经济思想通史著述中有所涉及,但往往语焉不详,或引据片言,骤下结论。李守庸同志的专著在这方面详人之所略,具有补白性的学术贡献。本书从王船山的“社会经济发展观”、“土地思想”、“赋役政策思想及其它财政思想”、“商品货币思想”、“义利观”等侧面,进行了深入发掘、全面剖视和系统评述;全书逻辑结构严整、思想辨析精细,举纲张目,逐层展开,为读者展示了王船山经济思想的全貌,推进了船山学术的研究。

二、史料翔实,持论有据。船山遗书,卷帙浩繁,授徒之作与心得之作、复述陈言与独抒创见,往往并存,难于分疏;加之人们所采视角和认识水平不一,对船山思想的诠释产生某些歧解是自然之事。学术真理本来是在各种歧解乃至“相反之论”的多元发展和互相争鸣中展现的,关键在于持论有据、言之成理。李守庸同志对王船山经济思想的评论,与前人和并世诸家所论,或同或异、或似或反,但均以全面占有船山有关思想资料为立论依据,博引详证,自成条贯。尤其突出的是,本书采取叙评结合的方式,在融会贯通王船山经济思想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如实地陈述船山言论的主观动机、致思理路和客观社会作用,然后评论其思想价值的长短得失和历史地位,给人以“设身易地以求其实”,毫无“浮以求明”的牵合之感。例如作者关于王船山经济思想中具有近代启蒙特色的部分,自有一套见解:在土地问题上,王船山以“有其力者治其地”为理论依据,批驳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教条,论证了土地民有,设想保护和发展以自耕农民为主体的小土地所有制,并提出了某些有利于实现这种理想的赋役政策主张;在商品货币问题上,王船山对商品货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商人在商

品货币流通中的社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肯定态度,对价值规律通过自由贸易而发挥作用,也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在理欲义利观上,王船山强调财利对于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反对禁欲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理、欲一致、承认满足人民欲望的正当性。这些见解,都是在对王船山的经济思想资料进行综观、密辨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持论铮铮有据,令人信服。

三、宏微结合,评断允当。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力求对王船山的经济思想作出公允恰当的评价,防止拔高和贬低,是此书又一显著特色。作者运用“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紧紧扣住王船山所处的特殊复杂的时代背景,联系王船山的生活经历,来评价王船山经济思想的诸侧面。作者指出,王船山所生活的十七世纪末叶的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开始崩解、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开始萌生,但前者仍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王船山是这一历史时期“地主阶级中较具远见的、进步的思想家”;因此,在王船山的经济思想中,“除了一些反映近代特色的进步观点之外,还具有不少甚至更多的维护旧的生产方式的保守观点。我们既不宜只看到后者而将其经济思想中的近代特点一概抹杀,也不宜只强调前者而予以过高的估价。”作者把对王船山经济思想的这一宏观总体判定贯彻到具体的思想资料的分析之中,认为:王船山的社会发展史观,“在尖锐地批判复古主义者的同时,自己也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的羁绊”;王船山“均天下”的主张,反映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批判精神,同时也反映了王船山在土地问题上企图维持现状的保守一面”;在“金”与“粟”即商品货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矛盾中,王船山“总的立场是站在‘粟’即自然经济一边,反对‘粟死金生’,而赞成‘粟生金死’”;其义利观中,“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等等。在作者看来,王船山经济思想中正面观点和负面观点并存,封建的传统保守思想和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见解交织在一起,这一思想的矛盾只能用社会存在的固有矛盾来说明。王船山的经济思想中封建保守的观点所占的比重较大,那是因为明清之际商品货币经济虽有着较为显著的发展,但“仍然属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同时也与王船山受儒家的传统保守思想薰陶甚深有关。因此,作者主张,对王船山的经济思想,“既回避其中本来存在的矛盾,同时避

免将其本来矛盾的见解作勉强求其统一的解释”,不因其长而讳其短,亦不因其短而避其长,才能作出较全面、客观、允当的评价。

为了对王船山的经济思想作出全面允当的评价,作者在本书中采用纵横比照的方法,即把王船山放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源流中,与前人和并世的其他思想家相比照,以衡量其见解的高低,评价其贡献与局限。诸如:作者把王船山的土地思想与历史上西汉的董仲舒、唐代的陆贽、北宋的苏洵、明朝的丘潜的土地思想相比较,指出王船山保护和发展以自耕农民为主体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主张,是其“超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但又指出:“很难认为王船山的土地思想有着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精神,或显示出一种市民阶级的理想”;因为“如把王船山的土地思想和他基本同时的颜元、李璫、王源等人的土地思想相比,就显得有些逊色了”,他们“都较王船山的土地思想具有更大的进步意义,更富于近代的特色”。作者将王船山的赋役思想与同世的黄宗羲、顾炎武的赋役思想相比较,指出王船山的分别自种与佃耕差等以为赋役之制和强调赋税征收折色优越性的主张,比黄宗羲、顾炎武在这方面的主张,“更能反映和更加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代要求”。作者将王船山的商品货币思想与黄宗羲作对比分析,认为,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命题,王船山受重本抑末观念影响较深;而船山对商品货币作用的认识却又较黄宗羲深刻,因此,“各有长短,总的说都是在并未更多地突破旧有观念的前提下,各具若干符合时代要求的进步的见解”。作者这种纵横比照的方法,是符合唯物史观,也是符合辩证法的

以上仅从本书的方法论和主要观点上,略举了贡献与特色,至于对王船山经济思想的具体分析中还有许多真知灼见这里不再一一论列。当然,任何著作都不会圆满无缺的,在我们看来,本书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作者对王船山经济思想的二重性花了很大功夫去把握,应该说思想的二重性必有其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于思想矛盾体中“新的突破旧的”而“死的又拖住活的”的复杂情况,既需要如实评估,又不排斥评释者按特定时代需要的价值取向,就此而言,作者对王船山“破块启蒙”的思想光辉的评价似乎拘谨有余,而彰显不足。然此仅是见仁见智之别,丝毫无损于作者对于船山经济思想的研究,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